

September 2012

The Folklore-Archetypal Criticism of Femininity: with the Female Image of Southern Yangtze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s a Critical Example

Haiying Ma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Mao, Haiying. 2012. "The Folklore-Archetypal Criticism of Femininity: with the Female Image of Southern Yangtze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s a Critical Exampl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5): pp.132-13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5/1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论

——以现代文学江南女性形象为批评范例

毛海莹

摘要: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一次突破与创新。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理论是在文学人类学精神关照下诞生的一种本土化的女性文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渊源是女性主义原型批评,运用此对现代文学江南作家笔下的女性文学形象进行分析,可以触摸到一条由民俗主题原型、民俗形象原型、民俗意象原型串联起来的“原型”发展轨迹。经过现代文学的多维诠释,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凸显出其理论实质,即注重普遍性与整体性及内部精神生态意义的开拓,注重个体性与特殊性及作家内在创作气质的彰显,注重心理原型与文学原型的融合并创造审美愉悦。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理论是中国文学本土化实践的又一先例,对于女性个体形象塑造及女性内在思想开掘都具有着先锋的意义。

关键词:民俗—原型批评 女性气质 江南女性形象 现代文学

作者简介:毛海莹,文学博士,宁波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文艺民俗学研究。本文为2011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研究——以现代文学江南作家为例”[项目编号:11JCZW02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电子邮箱:maohy0612@hotmail.com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了博士生导师陈勤建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Title: The Folklore – Archetypal Criticism of Femininity: with the Female Image of Southern Yangtze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s a Critical Example

Abstract: The folklore – prototypal criticism of femininity is a native theory on Chinese female literature criticism, originated from feminist prototypal criticism. The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female image in Southern Yangtze literature and tries to delineate a trajectory of prototype development from the theme, the figure to the imago in folklore. Under the multiple approaches to modern literature, folklore – prototypal criticism of femininity has also taken on mor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three aspects: the emphasis on exploration of universality and totality along with the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inner world development, the emphasis on individuality and particularity along with the prominence of the author's inner creative temperament,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fusion of psychological prototype and literary prototype along with the creation of aesthetic enjoyment. As an original native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Chinese literature, folklore – prototypal criticism of femininity may prove to be of unique significance in building female image and developing female inner world.

Key words: folklore – prototypal criticism femininity female image of Southern Yangtze modern literature

Author: Mao Haiying,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International College, Ningbo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female literature and folklore in literature. Email: maohy0612@hotmail.com

20世纪后期的中国文学由于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影响已面临严峻的挑战,“艺术死亡”、“文学终结”一度成为学界的流行语,文艺学、文学、美学等因此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并思考自身的价值。在跨学科、学科整合的大背景下,“人类学”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给文艺、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指出:“在整个20世纪,人类学的研究和文学艺术的研究之间的关系始终非常密切,值得作全面探讨”(41)。正是在文学与人类学融通互动的大

语境下,“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才有了构建的可能。本文试图对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建构的理论背景及在现代文学中的运用作深入地分析,并进而对其在文学中的存在意义及功能实质作合理地评判。

一、女性主义与原型批评建构的理论渊源

原型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途径和方法,曾因一度

取代欧美学界的新批评而风靡一时,在现代西方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起源于本世纪初的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盛行于北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学界纷纷引入西方理论与方法之时,原型批评也随之被引介到中国,并开始了本土化的生长与发展。第一个接过西方原型批评“接力棒”的中国学者是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及《探索非理性的世界》^①的相继出版标志着原型批评理论正式开始进入中国文学批评界的视野。在叶舒宪看来,“原型批评”最初流行的称谓是“神话批评”(myth criticism),泛指那种从早期的宗教现象(包括神话、仪式、禁忌、图腾崇拜等)入手探索和阐释文学现象,特别是文学起源和文学体裁模式构成的批评方法,因而也称之为“图腾式批评”、“仪式批评”或“神话仪式学派”(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12)。而关于原型批评的理论渊源,叶舒宪认为它主要受益于以弗雷泽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以荣格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和以卡西尔为代表的象征形式哲学。

然而,真正对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加拿大学者弗莱关于“文学原型”的批评理论。弗莱的文学原型批评理论在本质上渗透着人类学的思想,他将“文学原型”创造性地理解为“在文学中反复使用并因此而具有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这是独具慧眼的。从弗莱的宏论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启示,无论是西方文学还是中国文学,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都植根于各自的原始文化,要探寻文学的最初模式就必然要溯源到各自的神话与民间传说乃至宗教仪式上,因为“神话是所有文学中最传统化的部分”(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19)。正因为如此,中国20世纪初期的学者鲁迅、茅盾、闻一多、郑振铎等都不约而同地运用人类学方法对中国神话、古典文学、民间文艺等进行研究,这些可以视作“原型批评”在中国语境中的早期文学实践。后来的学者叶舒宪、程金城等更是有意识地运用西方的原型批评来重释中国文学的内在本质,如叶舒宪从中国古代祭祀组歌中发现至关重要的时(四季)空(四方)认同的中国文学原型“循环模式”,程金城将西方文化中的“原型”与中国古代的《易经》和“道”相关联,从而得出“原型是体验性的,是对于宇宙生命本体与人类生命本体的体验感悟的理性把握”的结论(程金城,《原型批判与重释》327)。不仅如此,程金城还特别指出,以《诗经》之“兴”、以《易经》之“象”为传统的象征系统,它们“与原型批评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具有天然的联结,也就是说,原型批评对中国文学有很强的适用性”(《西方原型美学问题研究》135)。这种论断有力地推进了原型批评在中国的文学发展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引入西方原型批评理论之际,另一种西方著名的理论——女性主义也被轰轰烈烈地介绍进来,“女性主义”与“原型批评”两种理论在中国的成功着陆为“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理论在中国的逐步扎根奠定了宽泛的语境基础,也预示

着“女性主义原型批评”在中国理论界的未来希望之旅。随着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1986)、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88)、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1989)、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1989)等西方女性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女性主义”在中国批评界已成为一个鲜明而独特的“符号”。1992年,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是宣告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合法地位。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交融、中西互照的语境下,“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理论在中国批评界发出了它微弱的“声音”。1990年《上海文论》的第3期刊登了由美国学者卡莉·洛克撰写的《妇女——神话的创造者》一文,第一次从正面译介了国外的女性主义原型批评,正如译者所述:“女性主义原型批评是一种极富吸引力的批评样式。目前,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介绍了不少,但有关女性主义原型批评方面的内容却几近于无”(转引自柏棣59)。言外之意,“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的到来对于当时中国文学批评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其实,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由挪威学者陶丽·莫依撰写的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章也被翻译到中国,分别是《阁楼里的疯女人》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两篇文章在不同程度上提及了跟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相关的“女性气质”等问题,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女性主义原型批评”在中国的“元文本”。

那么,究竟什么是“女性主义原型批评”?它的精神实质又是什么?笔者经过一番考察认为“女性主义原型批评”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女性主义原型批评”是对传统原型批评的反叛与颠覆。传统的原型批评强调原型是“永恒的、不变的”,而“女性主义原型批评”所注重的神话原型是基于女性不断变化的集体经验,因而也是流动的、没有等级的、非竞争的自我意识与自然意识。妇女总是在创造新文化神话,在这一创造的过程中妇女们也总是把自我意愿、个体想象融入其中,因此创造神话的过程是当代妇女集体的、历史的自我界定的过程,这些所创造的新文化神话则是女性躯体与思想不断融合、变化发展的有机整体。可见,“女性主义原型批评”在实践中以有效的方式向荣格提出了挑战。

第二,“女性主义原型批评”注重女性气质的模式。“女性气质”是一种文化建构,是女性主义用以区别“女性”的一种关于人类性别和愿望的非本质的理论。“女性”和“男性”是一起作为性差别的纯粹生物学方面而保留的两个名词;而“女性气质”则是一种由文化和社会规范所强加的性别模式和行为模式,是代表教养的,是一种文化建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37)。这正是女性主义用以批判父权制的理论根据。从“女性气质”的批评角度看,父权制的压迫就在于将“女性气质”的社会规

范强加在所有生物学的女人身上,使原本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女性气质”不知不觉地落入父权制的圈套,并进而被其利用。“女性主义原型批评”就是要拯救这种畸形的性别模式,让“女性气质”不再成为父权制的“利用对象”,而以女性特有的自然本质、天生气质、女性创造力来争取女性的主体地位。

第三,“女性主义原型批评”对“女性气质”的建构是建立在社会性别理论基础之上,是对女性身体、思想、行为的一种全新建构。在福柯看来,性别不是天生的,男人、女人的形成都是与权力共存共变的。换言之,无论是女性气质还是男性气质,它们都是话语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话语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或者说作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工具,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驱使,话语开始为人们营造规范和制度”(董金平 147)。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政治话语有力地掌控着女性的命运,使女性无论在身体还是在思想、行为上都受到各种无形的羁绊。在这样强势、对立的话语中,女性的身体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女性的思想和行为也不断受到男权标准的束缚与限制,“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种种道德规范套在女性头上,女性因而成为屈从于男性话语的“牺牲品”。“女性主义原型批评”正是敏锐地觉察到了男权话语对女性建构的负面影响,因而寻求一种新的途径,利用女性主义的利器以全新的视角对女性的身体、思想、行为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建构,而这种女性气质的建构又恰到好处地融合了民俗原型批评“重意象、求一体”的特征,因而是值得探讨与研究的。

二、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之文学关照

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不论是历史现实还是事物本性,实际上都不是一次性给定的,因而不是固定不变的”(14)。话语的建构亦是如此。无可置疑,社会环境对女性话语的建构起着主导性的驱使作用。在男权统治的社会,女性的话语处于被奴役、被压抑的地位,男性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便是这样一部女性话语“被强暴”的历史。然而,随着时代的变更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女性的话语建构也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趋势,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地区,由于不同阶段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建构“女性气质”的话语主体也是不同的。对于中国二十世纪以来女性气质建构的不同话语主体,有学者曾做过如下划分:二十世纪中上叶——文化话语对女性气质的建构;建国以来至文革结束——政治话语对女性气质的建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话语对女性气质的建构。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方法从时间跨度上较为清晰地展示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女性气质建构的发展轮廓,有一定的可参考价值。然而,此划分法也暴露出其

较为严重的“政治化”倾向,并且对于文化、政治、经济话语的界定也过于绝对化。其实,在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影响女性气质建构的话语因素绝不是单一、孤立的,它们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但在复杂因素的背后总会有一种话语起着主导作用,这可以说是社会学层面上的女性气质建构。在此基础上,文学层面上的女性气质建构还受到文学自身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作家、作品、世界、读者”等因素是不可绕过的一系列问题。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文学进步与启蒙思潮息息相关,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受民俗启蒙思潮的影响甚大,一时间形成了“民俗与文学”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在此语境下,现代文学江南作家选择以“女性民俗”为切入口进行女性形象的创作,实则是将“民俗、人俗、人学”进行创造性地理解与整合,在此基础上所刻画的现代文学经典女性形象是真实、原始而富有活力的。作为一种具体的批评示范,现代文学江南女性形象无疑是合适的、典型的。按照女性气质建构的相关理论,现代文学江南作家以“女性民俗”为突破口所塑造的一系列江南女性文学形象,其外在形象背后所蕴含的“女性气质”同样受到社会学层面和文学层面两方面的影响。

从社会学层面上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女性正处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期,话语主体的变迁也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女性气质的建构。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国外文化思潮的冲击等都成为建构当时女性气质的重要的影响性因素。“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传统话语使女性已习惯于自己“被压抑”的角色,而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的“鉴湖女侠”秋瑾的横空出世,使女性气质的重构变成了可能。她反对妇女缠足,提倡放脚;反对妇女终日习女红,倡导骑马习武。从传统的家庭妇女到走向社会的时代新女性,秋瑾的言行举止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即“现代思想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是女性气质得以变更的重要原因。当然,除了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影响外,各种外来思潮也是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气质建构的重要因素。五四以来,西方科学、民主的话语使该时期的新女性气质与中国传统妇女的形象气质截然不同,追求自由、提倡科学,反叛世俗、倡导人性,在中西多元复杂的语境下,女性气质的中国化建构完成了其最初的蜕变与升华。可以说,中国的女性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转型期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女性群体气质,这是一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混合物”。而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气质”建构势必对该时代的文艺创作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论文艺观一方面强调“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强调作家头脑的加工作用(转引自吴中杰 21)。这种辩证、客观的文艺观同时提供给了我们深入认识文学层面的“女性气质”建构的锁匙。

现代文学江南作家对于其作品中女性典型人物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方面他们以社会生活为基础,从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中寻找艺术典型的生活原型,包括对社会转型期女性及“女性气质”的深刻体认;另一方面,现代文学江南作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与意识,他们希望生活原型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使之集中与升华,同时也更具典型性与普遍性。这样,现实中的江南女性及“女性气质”也融入了作者个人的艺术创造,作者将自身的体验、经历、学识、观念等渗透于文本,对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女性气质”有着创造性的独特见解,文学层面上的女性气质也由此被建构起来。

周永明在《原型论》中指出:“文学典型形象的意义只能在特定的时空历史环境中获得,而原型形象则普遍得多,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典型形象往往有某些原型的因素,此时,在具体的意义上讲,典型形象就是某一种原型在特定的文化场中所呈现出的特殊的原型态;从抽象的意义上讲,典型形象本身也可以代表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型。”这种将文学典型形象与原型形象有机联系起来的论断是十分有见地的,是文学与人类学结缘的具体化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学江南作家通过挖掘女性身上的婚姻、生育、信仰等女性特征鲜明的“民俗”,从而去表现女性生命内核、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深化作品主题思想。“女性民俗”正是融通连接女性典型形象与原型形象的必不可少的“纽带”。因此,我们从现代文学江南作家所刻画的系列女性文学典型形象之中可以寻找摸索出一条富有民俗意蕴的“原型”发展轨迹,笔者试结合“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作如下分析。

首先,现代文学江南作家在创作小说时无形中受到江南民间传说女主人公的影响,小说中作为原型的主题、情节、人物性格与民间传说的相关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段炼将文学原型的种类归并成六大类,即集体无意识、原始仪式和图腾崇拜、古代神话和圣经故事、民间传说、文学名著、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基本模式。这使我们联想到现代文学江南作家以“江南民间传说”为文学原型的创作。《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及《牛郎织女》被称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而其中《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三大传说的中心就在吴越地区(或今天所说的江南地区),可以说是吴越独特而浓郁的地域文化孕育了这些传说。三大传说之所以能广泛流传于江南大地,除了传说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三大传说的女主人公形象之中处处融合着吴越民俗的印记。祝英台“女扮男装”、“抗婚殉情”,孟姜女“裸浴结亲”、“千里寻夫”,白娘子突破人神界限大胆追求爱情,三位女性身上集结着坚毅、执著、善良、重情的品质,这也可以视作吴越“好勇轻死”之风在这些女性身上的体现和延续。此外,传说中所反映出来的主题,如抗拒权威、提倡男女平等,以及对爱情与自由的执著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极力推

崇,这些也都被作为文艺创作的“原型”保留下来。现代文学江南作家自然深谙这些民间传说的主题、思想、情节、人物等因素,因此他们在进行创作构思时难免会将这些作为“原型”的主题思想、人物精神等幻化移植到自己笔下的女主人公身上,于是便有了奋力抗婚的“祥林嫂”(鲁迅《祝福》)、大胆执著追求爱情的“白流苏”(张爱玲《倾城之恋》)、提倡男女平等的“苏怀青”(苏青《结婚十年》)。与此同时,像《为奴隶的母亲》(柔石)、《菊英的出嫁》(王鲁彦)、《三年》(郑振铎)、《春阳》(施蛰存)、《菖竹山房》(吴组缃)、《拜堂》(台静农)、《阿凤》(叶圣陶)等一组江南作家的小说通过揭露控诉一幕幕婚姻、信仰陋俗,从而呼唤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倡导对女性主体的理解与尊重。如果说江南三大民间传说的女性化倾向是对男权话语反叛的“符号”,那么这种“符号”又何尝没有在现代文学江南作家那里得到延续与渗透呢?

其次,现代文学江南女性形象也凝聚着母亲原型、寡妇原型及恶妇原型。按照荣格的观点,父亲原型和母亲原型是人类集体潜意识中比较常见的一对原型。父亲原型往往象征着“权威、尊严及力量”,而母亲原型则代表着“慈祥、救助与护佑”。在古今中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母亲原型以其普遍性、象征性的特点更易被创造与流传。宇宙自诞生以来就与女性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的“夏娃传说”与中国的“女娲造人”记载着女性创世的丰功伟绩。女娲神话这一母系社会的文化遗物赋予了“母亲原型”以最初的特征,即生殖繁育与慈爱护佑。“母亲原型”在古今中外的民间故事或文学作品中都大量地、反复地出现,有的以母神原型出现,像汉民族的七仙女、田螺姑娘、白娘子、观音菩萨、送子娘娘、麻姑、妈祖等,藏族和蒙古族中流传的龙女故事,纳西族的盐担娘神、怒族的女兽神,以及在世界许多民族间流传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等均属此类;有的以世俗母亲的原型出现,如高尔基的《母亲》,赛珍珠的《母亲》,中国作家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国民间故事《沉香救母》等,这些“母亲原型”所体现的是勤劳、善良、坚韧的爱与美的化身。周永明指出,在非神话时代,以往神话时代的神话和原型可以继续存在,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古代神话人物和故事直接转化为原型;二是原有的神话发生转化,故事本身及其人物产生了新质,原型和过去形象没有多大关系。笔者认为,现代文学江南作家头脑中的“母亲原型”正是由古代神话人物和故事直接转化而来的,是沉淀在自己潜意识中的一种情感,它不会随着时代的变换而被抹杀。但与此同时,“母亲原型”也会在特定时代环境下发生一定转化并产生新质,于是母亲护佑孩子、慈爱善良的原型就被深深地镌刻在了春宝娘、菊英娘、得银娘、祥林嫂等母亲的形象之中。这些“母亲原型”既是现代文学江南作家个人艺术创作的情感寄托,更是汉民族共同的对母亲崇敬的集体无意识的反映。郑元者教授指出,在图腾形象的“人形化”中,原始

人的精神世界赫然地萌生着生命力量的“升华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原始的崇高感(157)。从远古神话中的母亲原型到江南作家笔下的母亲原型，这种原始的“崇高感”在文学的历史隧道中被传承与延续着，这使得文学中的江南女性形象拥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量。

按照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的理论，母神原型也会在一定条件下置换变形为巫婆和女妖。中国民间故事如回族的“吃人婆”故事、藏族的“狼妻”故事，还有古代文学中的“女妖”、“女鬼”形象，世界各民族流传的《小红帽》中的“狼外婆”故事、《白雪公主》中“恶毒王后”的故事及希腊神话中“美杜莎”的形象等，均是母亲原型置换和变形的结果。这种情况反映在现代文学江南作家那里，便是一系列寡妇原型及恶妇原型的出现，寡妇原型有二姑姑(吴组缃《菉竹山房》)、莲(郁达夫《迟桂花》)、婢阿姨(施蛰存《春阳》)、白流苏(张爱玲《倾城之恋》)、十七嫂(郑振铎《三年》)等，恶妇原型有曹七巧(张爱玲《金锁记》)、阿凤母(叶圣陶《阿凤》)、大娘(柔石《为奴隶的母亲》)等。然而我们发现，这些寡妇原型和恶妇原型均不同程度地渗透着“女性民俗”的因子，那种女性特有的民俗身份及民俗心理被牢牢地定格在“寡妇”与“恶妇”身上。当然，这些为世俗所不容的原型或多或少也融汇着作家的同情、怜悯之心，是作家在特定时代环境下的创作心绪的外现。

再次，作为原型的民俗意象是现代文学江南作家用以透视女性内心的一种艺术手段。原始意象是对人类集体声音的一种展示，是人类探寻生命源头的途径。荣格曾言：“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101)。而傅道彬则认为：“中国文化的原型系统是兴与象。《诗》之兴与《易》之象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对原型最古老的理论概括”(10)。可见，原始意象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并不陌生，原始意象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更为广阔的中西贯通的生长语境。现代文学江南作家对作为原型的民俗意象的化用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对于小说女主人公性格的刻画是很有帮助的。以“蝴蝶”的民俗意象为例，《菉竹山房》中“蝴蝶”的意象在文中多次出现，从最初的绣蝴蝶姑娘“绣的各种姿态的美丽蝴蝶”到二姑姑菉竹山房唱和诗边沿上绣着的“密密齐齐的各色小蝴蝶”，“蝴蝶”意象所蕴含的女性气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绣蝴蝶姑娘眼里的蝴蝶是“柔美”的象征，那么久居菉竹山房的二姑姑眼里的蝴蝶则是“诡异”的符号。同一个意象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气质转变，还要归因于二姑姑那突如其来的命运打击及封建礼教对女性婚姻的戕害。“蝴蝶”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化蝶”的场景即使是凄美的，但也寓意着“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期望。“蝴蝶”这种最初的民俗涵义被保留、传承下来，并被运用到文艺创作之中。在《菉竹山房》中，“蝴蝶”作为民俗意象

的原型意义自然也被作者吴组缃化用到了文中，以衬托二姑姑与心上人“阴阳两隔”的凄惨境况。不过，笔者发现，由于原型场的不同，民间传说中的“蝴蝶”意象在现代小说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型场指的是原型存在的特定环境。……原型场是我们虚构的一个时空。原型在不同的原型场中表现出不同的状况”(周永明 113)。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原型也是发展、变化的，而并非像荣格所说的是固定不变的，这也正是女性主义原型批评所倡导的辩证、发展的原型观。此外，现代文学江南作家的作品里以“花”作为女性的原型象征也是不少见的，如郁达夫的《迟桂花》及女主人公“莲”，许地山笔下的“春桃”、张爱玲笔下的“王娇蕊”等等。方克强教授指出：“花的妩媚柔弱也与女性的气质外貌有某种相似性，易于激发相关的想象。更重要的是，花可能曾经是母系制社会的图腾。因此，花与女性互渗的意象，蕴含着一种普遍的人类意识，至少在大多数民族中，花是作为女性的原型性象征出现的”(方克强 29)。现代文学江南作家正是较好地利用了这些民俗意象作为原型，因此成功地刻画出了一系列女性人物的鲜明形象。

三、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之功能与实质

经过现代文学江南女性形象的多维诠释，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已基本具备了构建的雏形与理论的土壤。这一理论的构建与形成对于从“女性民俗”视角研究现代文学江南作家的创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原创性的意义，该理论的功能与实质也在互动的语境中得到进一步凸显。

第一，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注重普遍性与整体性，将“女性民俗”视作江南地域文化的镜子，并注重其内部精神生态意义的开拓。鲁枢元教授指出，精神生态就是人的精神与自然生态整体之间的关系，“自然生态的破坏与人类精神的颓败、与文学艺术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消亡是同时展开的”(鲁枢元 6)。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十分注重这种精神生态意义的开掘，它以“女性民俗”为切入口，较好地把握住了女性与自然本源同构的内在重要联系。女性与自然之间深刻而渊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父系社会之前的创世母神的崇拜之中，况且两者在对生命的孕育、创造、抚养方面有着十分相似的过程与本质。有学者专门对此做了研究，并认为女性与自然的本源同构这一思想原型的意涵基本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生育繁衍的母亲形象的生物性相似；二是地—母同生共构思维；三是女性对自然的支配力。可以这样认为，“女性民俗”的提出也正是基于女性与自然的这种水乳交融、互渗相通的内在本源联系。民俗是自然界中最本真的一种生活文化，它感应着自然发展的基本节奏，折射出自然进程的基本面貌，因此是地域文化的一

面真实的“镜子”。“女性”与“民俗”的结合诞生出“女性民俗”这一宁馨儿,它既是女性与自然本源同构关系的重要展现,同时也昭示出其本身特有的精神生态意义。尤为重要的是,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正是注意到了“女性民俗”这一概念所蕴含的自然性、原始性、生态性的宽泛意义,因此借助神话原型批评这种文学批评样式,将文学作品中渗透交织于女性人物身上的女性民俗还原到自然中,从而揭示人的精神状况与自然整体精神之间的普遍性、整体性关系。这些都是符合生态精神及其思想的,是对文学作品内部精神生态意义的深入开掘。

第二,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同时也十分注重个体性与特殊性,“女性民俗”作为论述的基点充分折射出了作家创作的内在气质与个体差异,彰显独特的文学典型。原型批评从“宏观”的视角出发把一些潜隐在作品本文背后的东西挖掘出来,深化读者的文学经验,从根本上把握作品的本质,这是原型批评与其他批评方式最大的区别之处,也是该批评方法被引起重视并得以流传的重要“法宝”。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原型批评方法所存在的缺陷。因此,我们在运用原型批评方法时就必须处理好“原型”整体与“作品”个体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像荣格和弗莱那样过分强调集体无意识和文学传统,也不能把鲜活的艺术作品一味地还原为种种原型模式中的实例,而应将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的能动性 with 个体气质凸显出来,突出他们在文艺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事实上,作家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在我们文学史中已有清晰地呈现,从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到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随着作家主体创作意识的不断提升,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也相应逐渐减少。吴中杰先生也十分注重对创作主体的创造能力的评价,他认为作家的创造能力主要由观察力、审美力、想象力和表现力等构成,^①这是创作主体之所以能在创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所在。以笔者之见,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能较好地处理“原型”整体与“作品”个体之间的关系,既保持原型与传统、原型与整体之间的既有血统,也能将创作主体鲜活的思想与文学作品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批评。这样做的好处是充分重视了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将作家的个体气质、文学经验、世界观、文学观等作为分析文本“独特性”的重要因素,从而强调文学作品的个体性与特殊性,以突出作品中鲜明的女性文学形象。

第三,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注重将荣格的心理原型与弗莱的文学原型有机融合,并对女性人物的内心进行批评,从而丰满文学形象并创造审美愉悦。一部文学作品的优劣与否,除了具备“原型”因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能让读者对其丰满的文学形象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并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享受;低劣的作品则不然,读者不但不能从中感受到审美愉悦,而且在形象的生动性、性格

的典型性、情感的真切性以及形式的独创性方面大打折扣。“文艺批评中美的标准是衡量作品艺术水平高低的尺度”(吴中杰 240)。真正优秀的作家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能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既具有强大的思想性,同时又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而“审美特性”便是作品艺术性的重要体现。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将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放置于批评的重要位置,强调审美对于女性的日常化意义,将民俗审美心理引入女性人物内心分析机制,也从接受美学的视角重新阐释女性民俗的深层美学意蕴,这一切都源于该批评方式对女性与审美的人本主义认识。只有把“人”作为艺术作品的主体,并且充分调动艺术家自己和读者的全副意识、意志和情感力量,才是对“艺术作品必须向人的这个整体说话”的本义的理解。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艺术作品也才能真正达到审美的境地。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特别强调女性作为“人”的一面,充分尊重女性的主体性,坚持文学的人学维度,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女性的性别优势与特征,将女性作为“美”的化身置身于文学场景,对女性人物从外在民俗形象到内在民俗性格进行深入开掘。较之原型批评与精神分析批评,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更加重视审美特性,弥补了传统原型批评的缺陷。^②

我们从上述三方面对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的功能与实质进行了较为粗浅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到,女性气质的民俗—原型批评既能保留西方原型批评的种种优点,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原型批评所存在的缺陷,特别是在普遍性、个体性、审美性方面渗透着中国本土化的因子,因而是民俗—原型批评在中国女性文学批评领域的一次尝试与突破。这对于女性个体形象独特性的凸显抑或女性内在思想性格的开掘应该具有先锋的意义与发展的前景。

注释[Notes]

①关于此两书的基本情况是: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叶舒宪著:《探索非理性的世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神话——原型批评》一书分为上、下两篇,选编了弗雷泽、荣格、弗莱、威尔赖特、列维—斯特劳斯、鲍特金、费德莱尔、伊藤清司等人著作。该书从“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渊源、原型概念的由来和发展、原型批评理论的体系化及原型批评方法的不同倾向”诸方面对这一批评流派的理论与实践作相关介绍并进行概括评价。《探索非理性的世界》一书共分六章,分别为“导言、原型批评的理论渊源、原型批评的理论体系、原型批评方法的应用、方法的综合运用的实例——人类第一部史诗解读、小结”。

②参见吴中杰:《文艺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4-102。

③吴中杰在评价原型批评方法时这样说道:“由于原型批评家们过分注意于考古,又使文学批评变成神话批评,他

们把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形象都和古代的原型联系起来,往往有牵强附会之嫌。而且,它与精神分析批评一样,忽略了美学评价,这对以审美为特征的文艺活动来说,总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参见吴中杰:《文艺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25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程金城:《原型批判与重释》。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年。

[Cheng, Jincheng. *Archetypal Criticism and Reinterpretation*. Shanghai: Dongfang Press, 1988.]

——:《西方原型美学问题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 *Studies on the Questions of Western Archetypal Aesthetics*. Hae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De Beauvoir, Simone. *The Second Sex*. Trans. Tao Tiezhu. Beijing: China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8.]

董金平:“话语与女性气质的建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气质变迁分析”,《江淮论坛》2(2007):146-50。

[Dong, Jinping. “Discour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Temperament: An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Chinese Female Temperamen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Jianghuai Tribune* 2 (2007): 146-50]

段炼:“论原型批评”,《文艺理论研究》4(1988):67-73。

[Duan, Lian. “On Archetypal Criticism.” *Journal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 (1988): 67-73]

方克强:“我国古典小说中原型意象”,《文艺争鸣》4:(1990):29。

[Fang, Keqiang. “Archetypal Images in Chinese Classic Novels.” *Journal of Literary Debate* 4: (1990): 29]

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Fu, Daobin. *Bells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 Archetypal Criticism to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荣格:“试论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神话——原型批评》,叶舒宪选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Jung, Carl.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y and Poetry.” *Mythological and Archetypal Criticism*. Ed. Ye Shuxian.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7.]

刘颖:“女性与自然的本源同构: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原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2010):35-39。

[Liu, Ying. “The Source Isomorphism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The Ideological Prototyp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2010): 35-39]

鲁枢元 夏中义:《从艺术心理到精神生态》,《文艺理论研究》5(1996):6。

[Lu, Shuyuan, and Xia Zhongyi. “From the Artistic Psychology to Spiritual Ecolog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5 (1996): 6]

卡莉·洛克:“妇女——神话的创造者”,董俊峰译,《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柏棣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Lokke, Kari. “Women as Mythmakers.” Trans. Dong Junfeng.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stern World*. Ed. Bo D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

陶丽·莫依:“阁楼里的疯女人”,赵拓、李黎、林建法译,《上海文论》2(1989)。

[Moi, Toril.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rans. Zhao Tuo, et al. *Shanghai Literary Theory* 2 (1989).]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陈本益摘译,《文艺理论与批评》6(1990):112-16。

[———.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 Chen Benyi.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s* 6 (1990): 112-16.]

吴中杰:《文艺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Wu, Zhongjie. *Introduction to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Ye, Shuxian, ed. *Mythological and Archetypal Criticism*.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7.]

——:《探索非理性的世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 *Explorations into the Non-Rational World*.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文学与人类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Literature and Anthropolog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3.]

郑元者:《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

[Zheng, Yuanzhe. *Aesthetics of Totem and Modern Man*. Shanghai: Xuelin Press, 1992.]

周永明:“原型论”,《文艺研究》5(1987):113。

[Zhou, Yongming. “On Archetype.” *Journal of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5 (1987): 113] (责任编辑:王嘉军)